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4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英語世界的中國
文學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英語世界的中國
文學研究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4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欧风偃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24 / 曹顺庆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614-6774-9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G112-53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1326 号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24)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774-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20.5
字 数	37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专 论

1	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项目特稿：英语世界中 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曹顺庆
11	麦丽芝牧师与英语世界第一部《易经》译本：一 个历史视角	李伟荣
24	英语世界鲁迅译介研究三题	顾 钧
36	魏理的中国古代诗人传记研究 ——以《李白的生平与诗歌》为中心	张西平 潘 青
44	英语世界楚辞翻译和研究述评	郭晓春
58	身份的置换：论 20 世纪英语世界乐府研究中的他 国化	陈远馨
70	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 ——论艾朗诺的苏轼研究	万 燚
83	英语世界中的“聊斋学”研究述评	李艾岭
93	英语世界《红楼梦》跨语际旅行的意象流失与人 物形象的变形	王鹏飞
109	徐志摩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现状介绍及《再别 康桥》三个英译版本对比研究	王树文
120	“一经品题，便作佳士” ——英语世界的李劫人研究成果与现象	蒋林欣 张叹凤
140	英语世界的胡适研究 ——以北美博士论文为例	郑 澈
157	跨异质文明语境下《寒夜》翻译的误读	王苗苗

- 165 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
——赛珍珠《水浒传》书名翻译的误读与变异 谢春平

变异学与译介学

- 176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得与失 黄立
186 英语世界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与研究的方法论及存
在问题 姜智芹
197 科学主义与中国文论的西方化 罗富明
213 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看中国功夫电影在英语世
界的被 Cult 石嵩
224 《论语》英译的文化话语变异研究 李泉
236 《文心雕龙》书名英译考 刘颖
249 他者视野中的谢灵运
——英语世界谢灵运诗歌的译介与研究 黄莉 晏生宏
261 李清照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考论 何嵩昱
273 英语世界唐代女性诗作译介述评 王凯凤

理论专题

- 288 回到贫民窟
——丹尼尔·阿勒孔和《小丑之城》 戴月行
301 艺术的消费功能研究 黄葵
310 试论李清照涉酒词的文化蕴涵 周志凌
317 从交往行为理论角度看弗朗索瓦·于连的中西比较 韩旭

【专论】

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项目特稿：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曹顺庆

一、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多重意义与价值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是顺应时代发展而诞生的一项课题。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由来已久，随着国际交流日渐频繁，国外关于我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并且从最初的零散状态逐步实现了系统化与全面化，这为探究中国文学外传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由于英语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与影响，考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无疑成为开展中国文学外传研究的一个直接有效的切入口。

通过长时间的尝试与探索，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这项课题如今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既有坚实的理论支持，又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贡献巨大。总的来说，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探讨：一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二是作为方法与机制的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三是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变异与他国化研究，四是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得失，五是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同中国学术界的互动。总体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确立并发展这一课题，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必须以具体的研究为基础。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可以具体分为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文献资料研究以及具体个案研究四个方面。前两个方面是一种整体研究，主要包括相关研究的综述，各种文学或艺

* 本论文为 2012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JZD016）阶段性成果之一。

术类型(如典籍、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电影等)的译介与研究,以及相关研究与中国本土学术界的互动;个案研究则是构成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单位。文献资料研究旨在统计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书目,并以目录与数据库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首先,这一课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延伸。考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研究状况,不仅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使其具备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而且也突破了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即在保持文明异质性的前提下,充分吸收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从而在平等对话与交流中审视中国文学。其次,这一课题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考察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为建立中国与英语世界的文学关系史作出贡献。另外,这一研究方式也在探究世界文学与世界诗学等更高层次的问题的路上迈出了极其坚实的一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再次,从更广阔的层面上看,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本土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本土的,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化,其接受者并不局限于国内或汉文化圈中,这要求文学创作者与文化建设者在强调本土性的同时也要充分思考世界性,只有兼顾好这两点,才能让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得更远。

除开上述三种意义与价值,探究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还有一个极为重大的意义,那便是为我国正在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要追溯到2011年的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写道:“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个战略的提出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的物质生活迅速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增强。从物质方面来看,中国在国际上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国的文化建设并没有跟上物质建设的步伐,“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①。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引

^①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可见，增强我国文化的影响力与实现文化“出口”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使命与全民的迫切需求。然而，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方法，“走出去”战略就只能是一纸空文。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出谋献策，它通过考察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机制与接受规律，让中国文学的外传在一定意义上实现有的放矢，这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基本立场的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中国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长期以来都站在一个接受者的立场，主动地引进西方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这一立场是近代以来中国整个文化态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从其他文明引进各类文化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并不少见，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从印度引进佛教这一过程发端于东汉，持续并繁荣于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尽管这一外来宗教与本土观点产生过巨大的冲突，但它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成的禅宗，更是成为了儒道之外撑起中华文化的第三大支柱。不少朝代的帝王都奉佛不辍，大力提倡与推进佛教的传播，梁武帝更是亲自说经讲法，四次舍身同泰寺，成为历代帝王笃信佛法第一人。同为积极主动的接受，佛教的接受与后来开始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乃至20世纪早期兴起的五四运动存在较大差别，这主要体现为后两个时期的接受是居于低位的接受。在经历了种种交锋与碰撞之后，中国文化节节败退，西方文化作为胜者，一步一步登上了真理的高台。1929年，胡适用英文写了一篇名为《中国今日之文化冲突》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用“全盘西化”的方式来解决文明冲突，这集中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虽然胡适之后有所更正，指出“全盘”仅是“充分”之义^①，但中国唯西方马首是瞻，带有自卑与落寞色彩的接受立场却已经扎根立足，甚至已是根深蒂固，至今都是国内许多文化人心中的隐痛。

中国文化的接受立场自然有它的好处，特别是在了解与运用西方文化方面。许多西方的知识与理论（包括最新的）都及时并有效地在中国语境中得到使用并发挥作用，相关领域也的确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西方文学理

^①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3—454页。

论为例,从新批评、形式主义,到阐释学、现象学、接受理论,再到结构主义、符号学,乃至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等,这些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无一不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而且为了正确理解与使用这些理论,学者们可谓煞费苦心。然而,这种立场导致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认识与对待本土文化方面。由于推崇西方文化,我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备受冷遇与忽视,虽然目前我国文化已经非常强调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与交流。然而,认定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积习却遗留下了种种难题。首先是对自己文化的生疏。以中国古代文论为例,国内学者长期使用西方的言说方式,以至于逐渐失去了自我言说的能力,陷入了“失语”的尴尬境地^①。当然,学术界目前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失语”问题,并致力于重拾自我言说的方式,寻找摆脱这一尴尬处境的出路。而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居于低位的接受立场使得国人丢失了与其他文明平等对话时应有的态度,而且这种“不知所措”在处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上尤为明显。中国文学在面向世界之时,两种背道而驰的声音总是会此起彼伏地响起:一边是中国文学迫切地想得到西方认可的渴望,而另一边则是中国文学自走自路的冷漠。无论是求得认可还是孤芳自赏,都直指着态度背后隐秘的自卑,正是这种自卑心态导致国人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之中很难做到宠辱不惊,不卑不亢。

如果说要建立一个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平台,首先需要克服这种自卑心态的话,那么要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去”,便不仅意味着丢掉自卑,更关键还在于改变中国与西方长期所处的关系,即将中国文化放在放送者的位置,而将西方视为接受者。其实,早在“走出去”战略提出之前,中国就有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尝试,许多中国学人都在有意识地将中国文学翻译成各国语言,以此把中国文学介绍给全世界。以许渊冲为例,他翻译了数目众多的中国古诗,出版了诸如《中国古诗百首读》、《汉魏六朝诗》、《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中国古诗词六百首》等多部译作。然而,国外读者似乎并没有接受这份好意。而且,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学人积极推荐中国文学却受到百般冷遇之时,中国文学自己早已经悄然地走了出去,并且走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早在明清之际,一部分中国文学作品,譬如《赵氏孤儿》就已在西方广为流传,并在国外文坛显露了一定影响力。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作品在国人眼中往往难以跻身经典文学之列,而且即便是经典文学作品,在国外接受者眼前展示的却常常是不为国人所知的一面。1915年,庞德在伦

^①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第50—58页。

敦发表了轰动诗坛的《神州集》，他以费诺罗萨的手稿为基础，共译中国古典诗歌19首，涉及《诗经》、乐府、古诗十九首的作品，以及郭璞、陶潜、王维、卢照邻、李白的诗作。这些译作广受好评，并极大地推动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然而，这些诗之所以能入选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语境中的价值与面貌，而是因为它们呈现了一个充满悲愁的现代荒原，而这正是当时西方注重并予以重构与拯救的对象。^①

既然中国文学有传出去的愿望，国外又有引进来的需求，那么，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本应该是一件你情我愿、互惠互利的乐事。但事实却是中国文学的传出与引入各行其是，供给与需求无法实现对接。对此，我们不得不深思问题究竟何在。其实，关键就在于立场的对换。只有对换之后，思考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才成为可能。作为放送者，为了推出自己的文学，势必要对接受者的兴趣、爱好、习惯进行一番全面的考察，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问题显得至关重要：他们接受了什么？怎么接受？为什么接受？这正是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致力解决的基本问题。

三、实证与变异中的传播与接受特征

英语世界面对中国文学究竟接受了什么？怎样接受？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意味着首先要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中传播与接受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本身进行考察，归根结底，要建立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学术史。就方法而言，这是向比较文学法国实证研究的回归。保罗·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② 法国学派抛弃了比较文学中的审美研究，招致美国学派的诟病，这自然是当今比较文学学者不可取的。然而，法国学派在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上获得的成果却是颇具价值的，其采用的方法也非常值得借鉴。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中的流传过程可以理解为法国学派所说的“经过路线”。路线的起点，自然是中国文学中的各类单位。它可以是一篇文章，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可以是一本著作，如《红楼梦》，可以是一个文类，如乐府，可以是文学观念，如“风骨”，也可以是一位文学家，如李白，这些统统被称为“放送者”；与之相对的是处在终点上的“接受者”，这里主要指英

① 区铁，李春长：《庞德〈神州集〉中的东方主义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46卷，第38页。

② 保罗·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干永昌，廖鸿钧，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语世界的研究者,以及他们的研究著作与观点。与一般的读者相比,以研究为目的的“接受者”的回馈更集中,也更系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路线两端往往有沟通媒介,即所谓的“传递者”,主要由译者与译作构成。在很多情况下,接受者也会担任传递者的任务。^①建立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史,意味着以“放送者”为课题划分单位,将英语世界中的“接受者”与“传递者”,也就是所有相关的译者、译作、研究者、研究著作“一网打尽”。然后,纵向地以时间为轴,对其进行排列与梳理。当然,仅按时间排序往往是不够的,对“接受者”与“传递者”进行各个方面的特征描述也是必不可少的。譬如,必要的阶段划分,对译者、研究者、译作、研究著作的全面介绍与概括,对它们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的探寻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以乐府为例,在梳理英语世界乐府译介与研究之时,就会发现乐府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诗歌到乐府的身份转变,也就是说一开始的译者虽然翻译了乐府,但是对该文类却浑然不知。乐府的翻译与研究也往往散布在带有中国诗歌总集性质的译著和带有文学史性质的论著,各个诗人或诗人群体的译著与论著、专题性的译著与论著,以及乐府的专译专著之中。此外,在所有乐府作品中,只有民间乐府最受欢迎。这些描述内容都是根据课题划分以及英语世界中的翻译与研究状况而定的。

就本质而言,这是一个“求全求备”的材料搜集与整理的工作,也是整个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基石,只有打好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其他后续研究才能站得住脚。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这条“经过路线”中,作为流传对象的文学本身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它往往伴随着诸多变异。遗憾的是,法国学派一心求同,忽视了这些变异。因此,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在借用法国实证研究之外,还须求助于变异学的方法。从各种角度考察变异现象,重现中国文学变异过程,是探测接受者兴趣偏好的关键途径,其中涉及译介学、接受学、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文类学、主题学、形象学等众多理论的运用:第一,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是创造性的叛逆,这种创造与叛逆主要表现在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和编译,以及转译与改译四个方面^②,考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主要就是找寻上述现象。例如,白安妮在《中国汉代民间歌谣》一书中只翻译了所有乐府作品中的汉代无名乐府,这与西方学者对乐府的认识紧密相连。第二,同一文学在不同文化或不同文明中的接受往往是各异的,而且在同一文化或同一文明中的不同

① 保罗·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干永昌,廖鸿钧,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②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6—160页。

时期，接受状况也是不尽相同的。同理，英语世界中关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必然有价值取向与意义理解上的特征，而这些认识本身和认识的理论方法，及其与国内的差异都是需要关注的。譬如傅汉思、白安妮等学者对民间乐府青眼有加，极力强调它的价值，而后周文龙又颠覆了这一倾向，认为文人模仿的乐府作品更为重要。另外，英语世界的学者前后采用了新批评、结构主义、互文性等方法与理论，与国内相比，研究者们更看重乐府的文学性或文本性，而非其音乐性。第三，文化“模子”不同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过滤与误读是变异现象中的突出代表，自然也是本课题重点考察的对象。例如，西方学者在乐府的文类研究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找不到适用于所有或者绝大部分乐府作品的规则，因而提出乐府并不是文类的看法。然而，在国内研究之中，乐府的文类身份经《文心雕龙》正式确认以来，一直都是不争的事实，从未出现类似的困境。第四，各国不同的文类划分以及同一文类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表现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特别是文学类型）的研究就时常面临这类问题。以乐府为例，乐府是我国古典诗歌下的一个亚文类，西方并没有这一文类的存在，因而在英语世界的乐府研究中，学者常常在乐府与歌谣两个文类之间建立类比关系，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五，许多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意象等文学要素往往是各国文学共有的，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也会有意识地优先地探寻这些共有的文学“主题”，他们的见解及其与国内看法的差别值得重视。第六，异国异域的形象从来就不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主观想象。在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时常出现对于中国各种形象的描述，这些描述本身的特征，以及与事实之间的差异也是变异的一大表征。总的来说，上述诸多理论在具体研究中都会在变异学的指导下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而译介学、接受学，以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三方面的思考尤为重要。

运用实证研究与变异学考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特征无疑解答接受了什么与怎样接受这两个问题。然而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寻找这些特征背后的各种动机与原因，回答为什么接受这一问题。只有这样，才足以站在异质文明对话的立场上，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方法。

四、异质文明对话中的策略思考

为什么接受？这个问题旨在研究导致这些变异的动机与原因，也就是变异背后的学术与文化的背景与结构。以英语世界乐府的译介与研究为例，译

者与研究者对民间乐府的关注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其一,就学术背景而言,民间文学与歌谣研究在西方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与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一既成的学术视野致使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看重乐府中的民间作品。其二,就习惯思维而言,英语世界的学者对原创性的强调,使得在他们眼中作为原型的民间乐府在价值与地位上高过模仿的文人乐府。其三,就文化倾向而言,当时的学者普遍强调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补充与反抗,而代表了边缘文化的民间文学自然会备受关注。这些需求与兴趣其实就是一种“他者”的眼光,但如果只是单纯地解答了第三个问题,找出了背后的原因,那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课题就还停留在比较文学意义上。而若要实现促进中国文学外传,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目标的实现,就应该站在增进异质文明对话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异质文明之间之所以能建立对话,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自然提供了一些可能性,然而这些共同点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在处理这些相同之处时要特别谨慎,因为它们背后的动机结构往往不尽相同。譬如20世纪的多位研究乐府的国内学者,包括陆侃如、罗根泽、萧涤非、王运熙、余冠英,他们都表示出了对民间乐府的兴趣,并一再强调民间乐府的价值,这与国外的认识一致。而除了对西方民间文学与歌谣研究的借鉴,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人民”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的文学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焦点话题。

事实上,真正在绝大程度上使异质文明沟通成为可能的是变异,因为变异本身就是文化过滤、本土化、他国化的过程。这解答了为什么国人自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往往更接近作品的真实状态,却并没有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而国外的翻译常常存在误读误译,却反而广受欢迎。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变异。单以中国文学的本来面貌为出发点,变异被习惯性地视为一种远离真实的消极因素。然而,若从异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而言,变异却是起着桥梁作用的积极现象,甚至可以说,没有变异,异质文明之间很难实现沟通。所以,寻找决定变异的“他者”眼光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应该主动地将“他者”的眼光转化为一种“他国化”的方法,积极地促进变异,用“他者”的话语来介绍自己的文学。也就是说,要理解、尊重以及适应异国的文化特征,让中国文学的传播入乡随俗。在此,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教义的策略就很值得借鉴。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面对着西方基督教与中国儒家学说两种迥异的文化,他们明智地选择了以儒学解释教义的方法,通过研读儒家经典,借助儒家的重要观念来宣教,从而减少儒士对这一异域宗教的排斥。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这一课题正是以相

同的方式——借助“他者”的眼光增加中国文学在异质文化中的“亲和力”，为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铺平道路的。

当然，这种“他国化”的方法并不表示要一味迁就“他者”的口味，丢掉自己的特色，而是在国内外文化的互动与碰撞中，探索出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合理方案。这便涉及第二个方法——国内外眼光比较法。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课题，其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对于同一个文学单位，国内外态度的相同与差异，并在双方的文化中分析造成这些相同与差异的原因。国内外眼光比较法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些相同与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找到国内外眼光的结合点。莫言的作品就是这种结合的成功范例。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写道：“（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描述我国的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状况无疑是国内作者与读者的需求。虽然国外读者也有了解中国的需求，但只有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魔幻现实主义进行描述，文学作品才能被接受与认可。可见，描绘中国生活的国内眼光与推崇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外眼光结合在了一起。上述现象是最理想的状态，也是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所在。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国内外眼光无法交织或者说国外的认识存在问题与偏差的情况，毕竟国内外的文化之间存在许多难以跨越的鸿沟。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就常会出现明显的误译与误读，对此要予以纠正。譬如，英语世界的学者习惯将无名乐府翻译为“ballad”（歌谣）或“popular song”（民歌），以此指示无名乐府的口头性与民间性。但就真实的情况而言，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这些无名的作品是民众创作或者口头创作的。所以，对这些问题的阐释是需要指正的。事实上，随着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成熟，已有西方学者指出了歌谣阐释与口头程式理论的运用并不适用于研究无名乐府，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以乐府的音译代替之前的意译，以减少对乐府身份的预判。可见，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者与研究者也在努力靠近事实的真相。

综上所述，为了促进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对话双方需要相互理解，相互靠近，对话才能顺利地进行。就我方而言，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这一课题主张将“他者”的眼光转化为“他国化”的方法，并进一步使用国内外眼光比较法。这两种策略保证了异质文明对话的可能，是推进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参考文献

- [1] Allen, Joseph Roe (周文龙). *In the Voice of Others: Chinese Music Bureau Poetry*

- (《以他人之声: 中国乐府诗》).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1992.
- [2] Birrell, Anne (白安妮). *Popular Songs and Ballads of Han China* (《中国汉代民间歌谣》). London: Hyman, 1988.
- [3] Egan, Charles H (易彻理). "Were Yüeh-fu Ever Folk Songs? Reconsidering the Relevance of Oral Theory and Balladry Analogies" (《乐府是民歌? 口头理论与民谣相似性之关联的再思考》),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2, (Dec., 2000): 31-66.
- [4] Frankel, Hans H (傅汉思). "Yüeh-Fu Poetry" (《乐府诗》), Birch, Cyril (白之).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中国文类研究》). Ann Arbor, Mich.: UMI, 2006: 69-107.
- [5] 曹顺庆. 比较文学学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 [6] 曹顺庆. 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 [M]. 文艺争鸣, 1996, (2): 50-58.
- [7] 干永昌, 廖鸿钧, 等, 选编.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985.
- [8] 欧阳哲生, 主编. 胡适文集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9] 区钜, 李春长. 庞德《神州集》中的东方主义研究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46 (3): 33-38.
- [10]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作者简介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麦丽芝牧师与英语世界第一部《易经》译本： 一个历史视角*

李伟荣

[摘要] 尽管麦丽芝翻译的《易经》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全译本，但是鲜有学者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即便是著作中提到麦丽芝，也是将其作为一个失败的例子以彰显理雅各在汉学界以及英译《中国经典》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麦丽芝不仅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易经》英文全译本的译者，还是英语世界朱子学的先驱，并且翻译过《礼记》。本文基于当时知名的期刊如《教务杂志》、《中国评论》和《爱丁堡评论》等原始资料和麦丽芝所翻译的《易经》和《英译朱子性理合璧》，评价麦丽芝在西方易学史和早期英国汉学史中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 麦丽芝 《易经》 翻译 影响 汉学

导 言

《易经》在西方的翻译、研究及传播始于16世纪，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及传播则始于19世纪。^①最先对《易经》进行翻译的是理雅各（James Legge），不过英语世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易经》译本的译者则是麦丽芝^②（Canon Thomas R. H. McClatchie, 1812—1885）。麦译《易经》出版于1876年，比理雅各的《易经》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项目编号：12BWW011），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语世界的《周易》研究”（项目编号：2010YBA052），以及“湖南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与 Gail Hershtatter, Christopher Connery 和 Rob Wilson 等知名中国研究专家进行过多次讨论，承蒙他们指正，特致谢忱！

① 李伟荣：《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未出版），2012年。详见论文第一、二章。

② “McClatchie”一名，中文有多种译法，如有麦格基、麦克拉奇、麦克开拉启，香港圣公会《公祷书》第408页译为麦丽芝。国内学术期刊的文章，有些称其为麦丽芝，有些则称其为麦格基，称麦格基的居多。另见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2. Leiden: Brill, 2001, p. 160.

译本早出版6年。

因为麦丽芝在教会和学术界的地位均不是特别突出,所以他并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国内外几乎都没有专门的文章对他进行研究。事实上,麦丽芝在汉学界具有一定的地位,一是他是英译《易经》的第一人,也是英语世界朱子学的先驱;二是他还翻译过《礼记》,可惜未译完,也未出版。

本文主要从《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和《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等期刊中搜集麦丽芝以及有关他的著作的资料,并对麦丽芝所翻译的《易经》和《英译朱子性理合璧》进行必要的分析,以评价麦丽芝在早期英国汉学史中的学术地位。

一、麦丽芝其人及其著作

麦丽芝牧师是英国圣公会海外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①的一员传教士,生于1812年^②,1844年被派到香港^③,又于1845年被派到中国上海传教,1885年辞世。

对于麦丽芝牧师的生平,并无详尽的史籍记载,且大部分大型的史籍或百科全书亦无收录,^④即便是颇具影响的《英国圣公会史》^⑤也只简略记述了

① 据《福声》“社言”(第31期,1933年10月1日出版,第2页),我们知道中华圣公会成立之前,“在北方称为安立甘,上海、长江则称为圣公会,在南方称为安立间,也有称为宗古圣教会”。

② 麦丽芝牧师的生平未见详尽的史籍记载,对于他的出生年月说法不一,有说出生于1813,有说出生于1814。本文根据与麦丽芝牧师同时代的金斯密(Thomas W. Kingsmill)在麦丽芝牧师逝世时所写的《追思麦丽芝牧师》(In Memoriam of Rev. Canon McClatchie)而将麦丽芝牧师的生年确定为1812年。

③ Rosemary Keen, “Editorial Introduction” i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有简略的记载,详见其网页<http://www.ampltd.co.uk/digital_guides/church_missionary_society_archive_general/editorial%20introduction%20by%20rosemary%20keen.aspx>。

④ 笔者查阅了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145-1990;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ity*, *Encyclopaedia of Britannica*,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和 Scott Sunquist, John Hiang Chea Chew, and David Chusing Wu eds., *A Dictionary of Asian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MI: W. B. Eerdmans, 2001。均无关于麦丽芝牧师的记录。

⑤ Eugene Stock,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ts Environments, Its Men and Its Work* (3 vols).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99. Vol. I: p. 376, 476; Vol. II: p. 67, 293, 587, 597; Vol. III: p. 223, 230, 560。